

实用主义与美育的“落地性”

——兼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当下省思

王亚芹, 王宇婷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百余年前,“以美育代宗教”说以其独特的原创性和启蒙性,在中西结合、古今融通的基础上开启了重建国民信仰的坐标系,成为当时社会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现代美学精神的实用主义致理思路。今天,美学思想的整体性滞后、美育实施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及美育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问题,向当代美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实用主义美学,尤其杜威的“艺术功用论”思想,为我们走出美学的“非功利性”惯识、实现美育的“落地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基于此,从实用主义视角重新回望与反思蔡元培先生百年之前的美育命题,实现当代美育的生活论转向,不啻为美育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以美育代宗教;美育;实用主义美学;审美无利害

中图分类号:G40 - 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413X(2020)05 - 0034 - 06

DOI:10. 13763/j. cnki. jhebnu. ese. 2020. 05. 005

现代中国美学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审美功能演变史。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一个具有原创性与启蒙性的美学命题,它见证并引导着现代中国美育思想建构的理论模式。在现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视野中,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评价性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充分肯定该思想中“非功利性”的一面,将美育视为精神的“救赎园”、信仰的“乌托邦”;二是指责其“功利主义”的倾向,认为该命题实际上是将美育视为一种外在功利的手段或工具。显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这

两种研究方向都是用“非实用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实用至上的批判的。实际上,它们都遵循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毋庸置疑,中国现当代美学思想的基本走向深受这种“审美无利害”判断的影响,固然这一判断有很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

百余年前,“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认,在中西结合、古今融通的基础上开启了重建国民信仰的坐标系,使美育具有了社会文化运动的实用主义意义。百年之后,科学技术和消费文化空前“内爆”,中国的宗教崇

收稿日期:2020 - 03 - 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微时代的‘具身化’美学思想研究”(16CZW009)

作者简介:王亚芹(1985—),女,山东聊城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王宇婷(1994—),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拜消隐,教育的功用性和实效性被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美育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甚至还面临着“落地之难”的新挑战。实用主义美学思想,尤其是杜威的“艺术功用论”,为重新审视“以美育代宗教”的时代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当前美育的“落地性”实践及生活论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一、“以美育代宗教”的实用主义指向

首先需要阐明的是,文中提到的“实用主义”主要指美国实用主义美学思想。美国当代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指出:“实用主义美学肇始于约翰·杜威——而且差不多也在他那里终结。”^{[1](P10)}强调了杜威对于实用主义美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蔡元培曾经把杜威称为“第二个孔子”,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首次向当时的国人推荐了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理念,后来在北京青年会的演说中又再次介绍了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甚至鼓励大家“试试杜威博士的新主义”^{[2](P192)}。实际上,“以美育代宗教”说与实用主义美学在美育的目标和宗旨等方面均存在很多共鸣,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美育理论模型,体现着我国现代美育基本思想格局,此后的很多美育思想都没有摆脱这个基本模式。

众所周知,“以美育代宗教”说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学习和借鉴西方新文化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中国近代儒学被新知识分子所打倒,西学纷纷涌入国内,国人面临着信仰缺失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困惑。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们意识到这种精神困惑才是“今日重要问题”,是一个“于我国有研究价值之问题”^{[2](P87)},但是他们又不希望完全信从西方的基督教,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的道德、知识等似乎都与宗教无关了。于是,“以美育代宗教”思想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其具有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性。

一方面,“以美育代宗教”说深受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的深刻影响。康德把世界区分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并认为二者既有相互隔离的一面,又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康德要找出一座沟通二者之间的桥梁,于是提出了“审美无利害”的命题。康德把这种具有普遍性、自由

性的美感,看作必然的现象世界与自由的本体世界之间的中介。按照一般的逻辑思路,我们习惯从人类精神活动主要功能的角度来探究宗教的根源。换言之,宗教的本质定义乃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制裁和信仰,它在某个时代、某个意义上也确实起到过类似康德所谓“审美的普遍有效性”^{[3](P222)}的联结作用。随着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人类的知识和道德已经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而走向独立。因此,使人类的美感与美育也脱离旧宗教的长期羁绊,便成为对“今日重要问题”的科学解答。

由此,蔡元培先生首先从中西方美术进化史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古代以及西方中世纪的雕塑、绘画、音乐、戏剧和文学等均呈现出脱离宗教的趋势。接着进一步说明了只有摆脱宗教的束缚,才能真正发挥美育对人类情感的陶冶作用。按照蔡元培先生的观点,世界上所有宗教立身的目的都是为了“激刺感情”,这里的“感情”指各门宗教的私见。这种私见的专有性和排他性,导致欧洲不同宗教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攻讦,宗教因此失去了“陶养”的作用,成为专门传达一己之见的工具。所以,“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2](P90)}。显然,我们不能以“宗教充教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先生正是沿着这条思路来分条缕析地阐述美育的重大意义: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所谓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以齐宣王之惛,尚能承认之。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性为标准之一证也。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2](P90)}

蔡培元先生在美育之前冠之以“纯粹”二字,

充分表明了美育的“超功利性”，可以视为对康德美学的创造性发挥与提升。其中所论及的“西山”“明月”“花石”“水木”“金字塔”“神祠”“剧场”“博物院”“音乐会”等无一不是“纯粹”的艺术之具象。同时，这些具有“超功利性”特点的艺术无疑具有普遍性，恰好可以弥补宗教“激烈感情”的自私与功利。实际上，审美活动本来是一种感性活动，但又被视为“判断”，这充分体现了审美所具有的两个鲜明特色，一是超越性，超越利害关系；二是普遍性，对每个人都有效。在蔡元培先生看来，人固然要生活于现象世界，追求现世的幸福，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生存的终极目标，人终究要超越现象世界而进入到实体世界之中，而美育是实现二者联通的中介与手段，“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2](P5)}。于是，美育便成为去除个人私欲，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普遍性工具。

另一方面，“以美育代宗教”说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的熏染，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素来以“伦理—道德”为思想本位，通过对人类心理的调节和修养来实现个体行为规范，即所谓的“诚于中而形于外”，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当时整个社会共同价值秩序的建立。根据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在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下，存在着特定社会系统的绝大多数成员同意和肯定的目标和原则，即社会的价值共识，这是社会文化系统中最稳定的因素^{[4](P19)}。而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不是用美育（或艺术）取代宗教的作用，而是要驱除愚昧和迷信，重建国人的价值共识。这不仅是国民文化改造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共同使命。据资料记载，当时丰子恺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中华美育会”，希望通过“鼓吹艺术教育，改造枯寂的学校和社会”，从而形成“艺术教育的运动”^{[5](P48-49)}等行为都可以视为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时代呼应。这些美育思想归根结底是与中国社会的国民改造运动同步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救国方案，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启蒙使命，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性质。

由此，倘若我们从整个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的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就不难发现，“以美

育代宗教”说其实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动荡中的民族性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做出的一种文化尝试，是对国民信仰和灵魂的一种别样的现代性改造。综观现代中国美学思想史，很容易发现，中国现代美学家们无论是追溯传统文化还是引进西学，其最终目标都是要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他们希望通过审美和艺术使国人的内心世界产生变革，并由此推动中国当时的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发生改变。“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后再返回中国”^{[6](P3)}是他们共同的致理思路。所以，中国现代绝大多数美学家都非常重视美育，他们想用美育来切实发挥拯救灵魂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作用，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性和现实指向性。

这种实用主义指向与西方现代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以及后来将美学视为道德或政治工具的“功利主义”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功利主义最极端的表现便是与工具理性捆绑在一起，将美育看做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强调其社会道德教化的功能，从而遮蔽与忽视了美育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但是，在蔡元培先生看来，“美之超绝实际”的特色乃是美育的根本，“又岂尚有利害得丧之见能参入其间耶！”^{[2](P91)}言辞之中所透露出来的意味其实是在强调其美育思想的独特性质，即通过美育引导人们对美的形式进行“无利害”的欣赏，实现人们精神（主要是情感）的纯洁与高尚，并由此推动社会的变革，最终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看似“实用主义”的思想既没有脱离现实生活，陷入“乌托邦”的空想境地；又没有完全沉湎于现实的功利需要，而放弃对理想与信仰的追求。毋庸置疑，蔡元培先生这种别具一格的“实用主义”美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前的文化与审美现实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实用主义对当代美育“落地性”的启示

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美育因其对人性较强的建构力量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整个现代社会的环境已经比较有利于蔡元培美育思想的贯彻与实施。虽然大到国

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小到具体的艺术实践,似乎都在高奏美育的主旋律,但是当代美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对于如何构建新时代的美育,如何引导美育真正“落地”,却仍然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一) 摆脱“审美无利害”之束缚

如果我们仅以康德的“审美无利害”立场去认知和衡量当前的美育现实,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无论是将美育视为社会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还是将其视为“非功利性”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种“非实用主义”(或庸俗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即把美育的工具和手段分离,使得美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错位与脱节。而真正的实用主义美学则建立在对“审美无利害”原则批判的基础之上,打破了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倡导“一元论”,主张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目的与手段、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连续性与同一性。

人们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时,便面临某种程度上的“精神荒原”。很多人习惯将美育置换成“大众文化”,将自康德以降的“审美无利害”传统置换为美学的“泛化”。这种矫枉过正的行为往往丢失了审美的内在底蕴,给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年人)造成价值误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兼具“文化启蒙”与“陶养性情”双重功能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更加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文艺圈的乱象做出了批评:娱乐圈走入了怪圈。一些艺人放弃了做人的基本原则,一些网站为博点击率,大肆炒作,推波助澜。那些真正为国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却鲜有提及,娱乐导向成了最大问题。实际上,不只是娱乐圈,整个社会都存在这种“娱乐至上”的乱象。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美育的功能。根据他的研究,最初,宗教主要是知识性质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知、情、意”(即科学、美学、伦理学)逐渐从宗教中独立出来。所以,他所说的美育代宗教并不是代替整个宗教,而是将宗教作为一个知识对象予以批判,美育要替代的只是宗教中起到美育作用的那一部分,通过美育使人的精神和人格得到自由而健全的发展。这充分彰显了“以美育代宗

教”说强烈的“去知识化”的时代意义。

在这一点上,实用主义美学与“以美育代宗教”说具有共同的理论气质。对于“唯知识论”对现代人性造成的分裂以及现代教育的异化问题,杜威给我们开出了一剂很好的药方。其“艺术功用论”摆脱了“审美无利害”的判断,使审美不再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乌托邦”,也不再局限于所谓“高雅艺术”或“精英文化”中,而是在艺术、审美、生活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在杜威看来,审美活动不是通过说教作用于社会的,而是通过“去除偏见,消除阻挡视线的污垢,撕开风俗习惯的面纱,使感觉的力量得以完善”^{[6](P360)}。所以,审美活动比伦理道德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引发并强调这种作为一个整体,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包罗万象的、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整体的性质”^{[7](P215)},也就是说,审美或艺术是具有能动性的,在很多方面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改造和熏陶的作用。当审美或艺术被恰当地运用和普遍地共享时,它就能发挥道德建设和督促作用,成为一种精神性的价值载体。美育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引领人们获得更丰富的生括经验,进而形成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模式。

(二) 秉持“经验”的可操作性

实用主义美学与“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样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为达成美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现美育的完美“落地”提供了可能。自康德以降的美学传统认为,世俗生活具有异化的性质,容易对人性造成戕害。艺术和审美以其超越性消除了异化,恢复了人的自由本性。这种无功利的审美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的美育理论和实践。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美育常常在人们的教育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缺场或无力。人们总认为审美、艺术和世俗生活是有距离的,美育只是满足求知需要之后的可有可无的闲暇或娱乐活动。此外,从当下丰富多彩的美育实践来看,尽管美育已经被正式纳入国家的教育方针之中,各高校开设了美学或各种艺术课程,各地的艺术馆、美术馆、博物馆以及校园中的艺术社团等也都蓬勃发展起来。但是,人们对于美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的认识仍然不够,美育在学校教育中也往往缺乏实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单纯的艺术课程设置上,被简化为“艺术教育”。实际上,“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并不

是同一个概念。

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有两个特性,一是关涉到生产、行动和制作各个方面;二是能为人们所直接享有。其实,两者概括起来就是审美活动具有可操作性。滕守尧先生将这种可操作性称为“生活向艺术靠拢”^{[8](P326)}。在日常生活向审美活动靠拢的过程中,手段与目的是统一的,由此才组成了“完整的经验”。也正是在此时,个体才能自由而自愿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审美活动中,达到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功用论“实用而不功利”,较好地处理了目的与手段、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关系,避免了审美功利主义和单纯艺术体验论的局限。它意味着美育的目标不在于追求一个终极的审美境界,而是引导个体将审美的态度贯穿于整个生活和生命状态之中。从而为美育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经验之中奠定了基础,把“无功利”的精英式美育变成更为现实可亲的“生活式”美育。由此,才能“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画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9](P80)}。至此,生命本身也就美育化了。这样一种美育观才更能恰当地在当前的整个教育过程之中“落地开花”。因为,美育从来都不是某种孤立存在的东西,不是仅供少数精英阶层享用的特殊存在,而是应该赋予一切生活,使一切人实现终极意义上的生命完善。

(三) 贯通理论与生活的美育观

当前还存在着美育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学科细分严苛等问题。譬如,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美学理论研究者对艺术并不精通,甚至有不少人都是“门外汉”。同样地,不少一线美育实践者往往只凭经验和感性做事,缺乏更高层面的理论提升素养,实践效果甚微。而现代美育新征程的开启必须有新的美学理论支撑,才能给美育实践以更高层次的引领。正如有学者所言:“没有美学理论的进步,便没有美育的进步。审美教育在当代面临的难题,归根结蒂是美学理论自身出现了问题。”^{[10](P96)}对此,实用主义美学思想,为当前美育的“落地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同时也为把握“以美育代宗教”的时代意义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实用主义美学主张现代美育应该从儿童开始,成为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一种自然化的生活方

式。美育作为一种陶养人格情感、实现人性自由而完满的艺术,既是最基础的人生修养,又是最高层次的人生境界。所以现代美育实现“落地性”的关键在于将美感的教育落实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主要教育领域中去,遵循教育的自然规律,“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出发”“从做中学”,只有保持这种有机、动态的统一,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与蓬勃生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美育实践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我们的美育研究也必然会进一步向纵深开拓前进。当政策层面的惊喜变成每一位美育实践者、美育研究者都习以为常的常态,我们对美育的思考也将从阶段性的喧嚣中沉淀下来,从而更好地反思既往,立足当下,面对未来。”^{[11](P44)}

当然,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预测未来,但美育一定是人类生命世界中一种永恒的存在。这种存在不再是形而上的“审美无利害”思想,也不是单纯为了某种现实欲望的“功利主义”手段,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化的美育。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当前美育的“生活论改造”观点,并认为“将美育对于现代人生、生活现实的改造功能加以具体化,将生活改造的价值意图实践化,充分体现了包括‘以美育代宗教’在内的整个现代中国美学的精神方向。”^{[12](P8)}它是现实生活的审美强化,也是生命存在的自我拯救,最终使人类不能不进入那片渴慕已久的、自由而美丽的栖居圣地。

结语:新时期中华美育的历史使命

毋庸置疑,尽管当前我们的审美教育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但是美育的精神与历史已经滋养了我们几千年,特别是中华民族的美育传统必然、也应该在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弘扬和发展。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美育工作,美育不但被纳入到国家的教育方针中,而且还经常出现在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中。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将美育定格为人格教育,并提出学校美育要“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13]也就是说,真正的美育是对人的生命的培养和满足。就个体而言,没

有受过学校美育的人,其精神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一定不是完满的。2018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就做好美育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要求“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并强调美育对于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的特点,让祖

国青年一代的身心都能健康成长,用美育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素养,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这不仅是我国包括蔡元培先生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而且是新时期中华美育的核心精神与历史使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秉持“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理念的美育,对我国新时期教育的总体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彭 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2]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 [3] 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4]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5] 俞玉滋.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1999.
- [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7] [美]杜 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8] 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艺术化生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 [9] 张圣华.蔡元培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 [10] 刘成纪.美育哲学基础的重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 [11] 林清凉.2015年中国美育研究述评[J].美育学刊,2016(4).
- [12] 王德胜.功能论思想模式与生活改造论取向——从“以美育代宗教”理解现代美学精神的发生[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9).
- [1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EB/OL].(2015-09-15)[2020-07-01].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28/content_10196.htm.

Pragmatism and the Practicalit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 Current Reflection of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WANG Yaqin, WANG Yu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idea of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its originality and enlightening nature, provided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rebuilding the national belief on the basis of a reconcili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the Eastern ideas and the Western thought. As a part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ovement at that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laid a pragmatic rationale for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spirit. Today, the generally outdated aesthetic thoughts, the utilitarian tendenc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aesthetic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pose new challenges to contempo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Pragmatic aesthetics, especially Dewey’s “functional theory of art,” provides us with abunda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to get rid of the “non-utilitarian” aesthetic belief and realize the practicalit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a new path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o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Cai Yuanpei’s aesthetic education proposition one hundred years a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sm, and orient the contempo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toward the discussion of life.

Key words: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pragmatist aesthetics; aesthetic disinterest

[责任编辑 冯琳]